

汤用彤评传

麻天祥、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AI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國學大師叢書

趙景初題



汤川秀树传



汤川秀树

汤川秀树先生追悼会

昭和二十九年

汤用彤评传

麻天祥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LI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國學大師叢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汤用彤评传 / 麻天祥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12

(国学大师丛书)

ISBN 978-7-5500-1177-9

I. ①汤… II. ①麻… III. ①汤用彤 (1893 ~ 1964) - 评传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3431号

汤用彤评传

麻天祥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统 筹	毛军英
责任编辑	张 越 童子乐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9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16 印张 20.25
版 次	1993年8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2版 2015年3月第2次印刷
字 数	29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177-9
定 价	34.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4-30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国学大师丛书》编辑委员会

《国学大师丛书》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永兴	石峻	任继愈	刘桂生	汤一介
阴法鲁	张岱年	季羡林	周一良	庞朴
赵朴初	姜义华	龚书铎	戴文葆	戴逸

组织编辑委员会成员:

桂晓风	熊向东	刘国藏	邓光东	周榕芳
朱焕添	王志斋	范卫平	关小群	钱宏
彭开天	傅伟中	李晃生	朱光甫	毛军英
尹飞舟	赵焜森	刘义林	董士伟	王守常
方鸣	钱文忠	傅修延	陈晋	宋志明
景海峰	赵丽雅	李晓岗	陈娟	黄卓越
陈骏涛	刘烜	魏漫伦	刘庆生	

丛书封面题签	赵朴初
丛书总体编辑	钱宏
丛书肖像木刻	颜仲

总 序

张岱年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


 汤川彤
评传

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觥，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葑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覿，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

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国学大师丛书》在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下，就要陆续与海内外读者见面了。

当丛书组编伊始（1990年冬）便有不少朋友一再询问：为什么要组编这套丛书？该丛书的学术意义何在？按过去理解，“国学”是一个很窄的概念，你们对它有何新解？“国学大师”又如何划分？……作为组织编辑者，这些问题无疑是必须回答的。当然，回答可以是不完备的，但应该是明确的。现谨在此聊备一说，以就其事，兼谢诸友。

一、一种阐述：诸子百家三代说

中华学术，博大精深；中华学子，向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著称于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出现过三个广开风气、大师群起的“诸子百家时代”。

第一个诸子百家时代，出现在先秦时期。那时，中华本土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演进，已渐趋成熟，老庄、孔孟、杨墨、孙韩……卓然颖出，共同为中华学术奠定了长足发展的基脉。此后的千余年间，汉儒乖僻、佛入中土、道教蕰生，中华学术于发展中渐显杂陈。宋明时期，程朱、陆王……排汉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倡先秦之脉、兴义理心性之学，于是，诸子百家时代再现。降及近代，西学东渐，中华学术周遭冲击，文

化基脉遇空前挑战。然于险象环生之际，又一批中华学子，本其良知、素养，关注文化、世运，而攘臂前行，以其生命践信。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黄侃、陈寅恪、钱穆、冯友兰……他们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在文、史、哲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重开新风而成绩斐然。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遂傲然世出！

《国学大师丛书》组编者基于此，意在整体地重现“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之盛况，为“第三代”中华学子作人传、立学案。丛书所选对象，皆为海内外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对经、史、子、集博学宏通，但治学之法已有创新；他们的西学造诣令人仰止，但立术之本在我中华从而广开现代风气之先。他们各具鲜明的学术个性、独具魅力的人品文章，皆为不同学科的宗师（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但无疑地，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学术理论又具有其时代的共性。以往有过一些对他们进行个案或专题研究的书籍面世，但从没有对他们及其业绩进行过集中的、整体的研究和整理，尤其未把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群体（作为一个“大师群”）进行研究和整理。这批学术大师多已作古，其学术时代也成过去，但他们的成就惠及当今而远未过时。甚至，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我们至今仍未达其深度，某些理论我们竟会觉得陌生。正如第一代、第二代“诸子百家”一样，他们已是中华学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研究他们，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本身。

对于“第三代诸子百家”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整理，我们恐怕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展开。《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织编辑，是一种尝试。

二、一种观念：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

纵观历史，悉察中外，大凡学术的进步不能离开本土文化基脉。但每一代后起学子所面临的问题殊异，他们势必要或假古人以立言、或赋新思于旧事，以便建构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学术。这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在每一代学子身上的最好体现。以上“三代”百家诸子，莫不如是。《国学大师丛书》所沿用之“国学”概念，亦当“赋新思于旧事”而涵注现时代之新义。



汤川彤
评传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四杰继起，矫正道统，斥宋儒，首倡“回到汉代”，以表其“实学实行实用之天下”的朴实学风，有清一代，学界遂始认“汉学”为地道之国学。以今言之，此仅限“国学”于方法论，即将“国学”一词限于文字释义（以训诂、考据释古文献之义）之范畴。

《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此其一；其次，既是中国学术便只限于中国学子所为；再次，既是中国学子所为之中国学术，其方式方法就不仅仅限于文字（考据）释义，义理（哲学）释义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综合起来，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和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这些文献，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为经学（即“六经”，实只五经）及文字训诂学；史部为史志及地理志；子部为诸子及兵、医、农、历算、技艺、小说以及佛、道典籍；集部为诗、文。由此视之，所谓“国学家”当是通才。而经史子集会通和合、造诣精深者，则可称为大师，即“国学大师”。

但是，以上所述仍嫌遗漏太多，而且与近现代学术文化史实不相吻合。国学，既是“与西学接触后的中国学术”，那么，这国学在内涵上就不可能，也不必限于纯之又纯的中国本土文化范围。尤其在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建构方式上，第三代百家诸子中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们，事实上都借用了西学，特别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及与考据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证方法，还有实验方法、历史方法，乃至考古手段……而这些学术巨子和合中西之目的，又多半是“赋新思于旧事”，旨在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范式。正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们今天使用语言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乃得之于斯！如果在我们的“国学观念”中，将他们及其学术业绩排除在外，那将是不可理喻的。

至此，《国学大师丛书》之“国学”概念，实指：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国学大师”乃“近现代中国有学问的大宗师”之意。因之，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固为国学，以探究义理心性为特征的“宋学”及兼擅汉宋者，

亦为国学（前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后者如陈寅恪、马一浮、柳诒徵）；而以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为依傍、以西学为镜鉴，旨在会通和合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当为更具时代特色之国学。我们生活在90年代，当取“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国学）的观念。

《国学大师丛书》由是得之，故其“作人传、立学案”之对象的选择标准便相对宽泛。凡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并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现代风气之先以及首创新型范式者皆在入选之列。所幸，此举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当今学界老前辈的同情和支持。

三、一个命题：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及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全面评价和把握他们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络。唯其贯通近代诸子，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趋势，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

钱宏（执笔）

1991年春初稿

1992年春修定

008



汤用彤

汤用彤

序

汤一介

汤用彤先生(字锡予)生于1893年,今年恰好是他的百年诞辰。为纪念他,北京大学出版社将出版《国故新知——汤用彤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季羨林先生为此文集写了一篇序,在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叶学术发展有一个大转变。俞曲园能熔铸今古;但是章太炎在熔铸今古之外,又能会通中西。……太炎先生以后,几位国学大师,比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等,都是既能熔铸今古,又能会通中西的。……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这实际上是国内外学者之公言,决非我一个人之私言。

季先生对用彤先生的评价提醒我们:对用彤先生这样的国学大师有必要作系统、深入的介绍和研究。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颇有眼光和胆识,即将推出《国学大师丛书》,麻天祥同志为这套丛书撰写了《汤用彤评传》。麻天祥同志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钱宏同志几次来信,嘱余撰序。对我来说,这自



汤用彤
评传

然是责无旁贷之事。在本书出版之前，我想据自己的一些切身体验和近人的记载，从为学与为人等方面再谈谈我对先父用彤先生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用彤先生之所以能成为近现代国学大师，我想是因为他一生抱定了一条为学宗旨，即“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而这一宗旨正是上述季羨林先生所谈的近现代国学大师们的共同特点。

大凡用彤先生那一代学者都有家学渊源，为学与为人也都颇受家风影响。我的祖父汤霖，字雨三，晚年号颐园老人，光绪十六年进士，做过甘肃省渭源知县，为官时间很短，丢官后曾在兰州、北京设教馆。雨三公素喜汉易，亦喜吟诗诵词，平常最爱吟诵《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和庾信的《哀江南赋》。用彤先生幼时寡言，但三岁那年，他有一天突然一字不差地背出《哀江南》，雨三公很惊异。用彤先生由此得以很早进入雨三公的教馆接受早期教育，“幼承庭训，早览乙部”，自幼便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且养成了以同情之眼光理解历史人物及史实的读书习惯。

辛亥革命那年，雨三公的弟子二十多人及用彤、用彬（我伯父）先生一行人在万生园（今动物园）为雨三公庆祝六十一寿辰。当时正是盛夏，离武昌首义还有几个月，但雨三公已预感“时事迁流，今后变幻不可测”。在离都归湖北黄梅老家之前，雨三公诏示弟子儿辈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等“立身行己之大要”，告诫弟子儿辈“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雨三公的告诫均载于《颐园老人生日燕游图》（由雨三公门人吴本钧绘），对用彤先生影响甚深，他们一直珍藏着这幅长卷。用彤先生任教于东南大学、支那内学院时，曾请一些名士、友人如欧阳竟无、柳诒徵题诗于上。1938年，在用彤先生的传世名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刊布之前，用彤先生在该书的跋中还非常感念地记述雨三公对他的影响：“先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己之大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

用彤先生毕生潜心于学术研究，尤爱史学，自然是因为早年雨三公“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并得以“早览乙部”。辛亥那年，他考入了清华学校，据用彤先生的挚友吴宓记载，初入清华时，用彤先生就已立下从事学术研究之志，并告之以吴宓。此前，他曾与梁漱溟先生在北京顺天学校共读印度哲学

及佛教典籍，在清华时，更是“寄心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清华学校当时对学生施以全面的洋化教育，资金来自庚子赔款奖学金，师资、教材、学制均采自美国，用彤先生除学好功课外，又与吴宓、闻一多等人进入当时新设的国文特别班，研习中国文化典籍，足见全面洋化教育并未消解他早年养成的对国学的酷爱。这一点很发人深思，使我想到：爱国主义必须建立在对祖国文化的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例如由于要加强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只照搬、灌输外来的思想，不考虑本民族文化的地位，对传统文化一概施加批判的大棒，甚至采取“除恶务尽”的粗暴态度，从而造成年轻人在文化认同方面的危机，甚至造成文化真空。那么，不管我们如何向年轻人灌输爱国主义思想，也会变成空洞无力的口号。“文革”后曾出现过多种危机，这些年又曾出现过“世界大串连”，年轻人唯恐闯不出国门，其原因诚然有物质生活方面的考虑，但在某种程度上，又不能不归咎于那些年造成的文化真空。物质的匮乏固然可怕，认同感的阙如同样会导致恶果。所以，我认为用彤先生当年能积极参加清华国文班决非出于对全面洋化教育的盲目排斥，而是出于一种文化认同感，出于对民族文化理智的反思和热爱。1914年，在当时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尚欠深入的情况下，用彤先生曾在《清华周刊》上发表长文《理学谰言》，立论以为理学是中华民族之真文化、真精神，全文阐王进朱，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今人也许会对此持特别种看法，但我认为用彤先生当时在全面洋化的教育氛围中能特立独行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也说明他在国文特别班的学习既深化了他的学养基础，也培养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当他于1916年夏天毕业于清华学校，并考取官费留美，却因治疗痧眼未能成行时，清华学校便聘请他以学生身份充任国文教师。钱穆先生因此赞叹道：“其时锡予之国学基础已可想见。”（见《燕园论学集·忆锡予》）

初入清华时，用彤先生还曾与吴宓合作撰写长篇章回小说《崆峒片羽录》，“全书旨在写吾二人之经历及对于人生道德之感想”（见吴学昭《吴宓与汤用彤》，收入《国故新知——汤用彤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不久，他们感到只写小说还不能满足自己参与民族文化重建的宏愿。当时吴宓希望能编辑出版一种杂志，“然后造成一家之学说，发挥固有文化，沟通东西事



汤用彤
评传

理，以熔铸风俗，改进道德，引导社会”（见《吴宓日记》1915年2月16日）。这也是他们二人相互切磋后的共同想法。虽然办杂志的想法未能即刻实施，但用彤先生与吴宓共同发起成立了“天人学会”。吴宓1916年4月3日在致好友吴芳吉的信中说：

宓自昨冬以来，联合知友，组织一会，名曰“天人学会”。此会用意则欲得若干性情、德智、学术、事功之朋友，相助相慰，谊若兄弟，以共得其所志……会之大旨：除共事牺牲，益国益群外，则欲融合新旧，撷精立极，造成一种学说，以影响社会，改良群治。又欲以我辈为起点造成光明磊落、仁慈侠骨之品格。必期道德与事功合一，公义与私情并重，为世俗表率，而蔚成一时之风尚。（见《吴宓诗及其诗话》，第210—211页）

吴宓后来曾回忆道：“天人学会最初发起人为黄华，会名则汤用彤所赐，会员前后共三十余人。方其创立伊始，理想甚高，情感甚真，志气甚盛。”（同上）可见用彤先生早年即已立志于以文化、学术工作改良社会、风俗、道德，并在与吴宓等人的合作中逐渐明晰地表述了其为学宗旨：在弘扬民族文化，吸收、融汇外来新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建设中国新文化，也就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如果说用彤先生在清华所受的是中国文化大背景下的洋化教育，那么，当他于1918年赴美留学时，则完全是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了。但这种洗礼同样没能使他变成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者，他仍然是特立独行的知识和真理的追求者。留美的头两年，他在汉姆林大学（Hamline University）学习的尽是西方哲学、心理学课程，成绩优异。但当他在1920年有机会自由选择学习专业时，他却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梵文、巴利文和印度哲学，这在当时是较为冷僻的学科。用彤先生作出这样的选择大概是基于他的多元主义的文化观，也与当时美国兴起的以白璧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思潮有关。18、19世纪，当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在英法等国蓬勃展开时，在西方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如德国就出现了一批思想家，他们反对工业强国对人性的蛮性冲决及对其